

Zengguofan Zhuan



曾国藩 传

池子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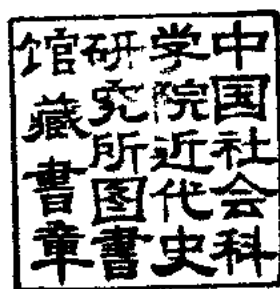


● 安徽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传

Zengguofan Zhuan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引子：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	(5)
一、“癫龙”转世	(5)
二、曾氏家族的宠儿	(6)
三、叩开科举之门	(8)
第二章 幸运京官	(14)
一、仕途得意	(14)
二、末世实学家	(18)
三、日常生活素描	(26)
四、“书生却进安民策”	(34)
第三章 从文官到军事统帅	(42)
一、“洪”水滔滔	(42)
二、墨经出山	(48)
三、编练湘军	(55)
第四章 坎坷征杀路	(65)
一、传檄进兵	(65)
二、廓清湖南	(71)
三、进军湖北	(77)
四、坐困江西	(83)

第五章 归隐与复出	(89)
一、整顿内湖水师	(89)
二、被削兵权	(94)
三、再度出山	(100)
第六章 总督两江	(104)
一、意在图皖	(104)
二、争夺安庆	(114)
三、满汉之争	(128)
第七章 “中兴第一名臣”	(134)
一、进攻天京的准备	(134)
二、攻克金陵	(141)
三、诛李荡余	(153)
四、裁湘留淮	(162)
第八章 “我是打捻无功之人”	(170)
一、奉命“剿捻”	(170)
二、攻捻方略	(178)
三、“我是打捻无功之人”	(189)
第九章 教案风波	(198)
一、查办扬州教案	(198)
二、调任直隶总督	(205)
三、处理天津教案	(214)
第十章 洋务运动之父	(226)
一、洋务派的领袖	(226)
二、经营“机器母厂”	(232)
三、开留学风气之先	(238)
第十一章 晚年曾国藩	(246)
一、审结“刺马案”	(246)

二、察访李世忠行迹	(255)
三、走完人生之路	(262)
结语：理解曾国藩	(270)
后记	(276)

引子：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曾国藩，生于 1811 年（嘉庆十六年），死于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口爆炸，民变迭起；大清帝国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势式微；外患频兴，国耻交至。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

清朝自立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统治，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随之大幅度增长。清初，中国人口仅 0.9 亿左右，而到乾隆初年，即 1740 年前后已剧增到 2 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道光初年，即 19 世纪 20 年代再翻一番，达到 4 亿多。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人的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过与不及都会造成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 4 亩方可维持生计。随着人口爆炸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1685 年人均耕地为 5.9 亩，1724 年 5.6 亩，1753 年 4 亩，1784 年 2.6 亩，1812 年 2.3 亩，1822 年 2 亩，1851 年 1.7 亩。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大量劳动者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成为“剩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的大量存在，“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过剩人口的严重堆积，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催化剂。1836 年—1845 年，民变次数为 246 次，1846 年—1855 年达 933 次，1856 年—1865 年更达 2332 次。

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官吏照样酣嬉优游,招权纳贿,卖官鬻爵,贪得无厌,吏治因而大坏。嘉庆年间,大贪官和珅伏诛,家产充公,私蓄竟达白银8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贪污贿赂恶风遂成不可扼制之势,弥漫朝野。吏治日非,为官者但知逢迎谄谀,恋权固位,至于民间疾苦,可以不闻不问。道光朝宰相曹振鏞虽琐鄙无能,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恩遇益隆,声名俱泰”。门生请问为官经验,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无名氏赋《一剪梅》,总结他们的作官经: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溢文忠,也溢文恭。”圆滑弥缝,吏治柔靡,相袭成风,国事不堪闻问。

士子文人,原是社会精英分子,但自从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士林风气一蹶不振。鲁迅先生指出:“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鲁迅书简》上册,第434页)这样的学问就是清代占据压倒地位的考据学。考据学又名“汉学”、“朴学”,初兴于清初,到乾隆、嘉庆时期达于极盛,故又称“乾嘉学派”。文人士子以此为好尚,抛开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流风所被,一般人也希声附和,以致“家家许(许慎)、郑(郑玄),人人贾(贾逵)、马(马融)”,训诂、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等,风靡全国。虽然对整理古文献不无贡献,但由此却形成了强劲的脱离现实的学风。这股灰暗沉闷的学术空气,直到嘉、道年间,文网稍弛,言路稍开,才稍有转变,经世实学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在裂变之中。1840年以前,中

国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这是封建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表现为“耕”(农业)与“织”(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就是这样一幅自然经济图景。耕与织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作为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限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扩大,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耕织结合,自给自足,市场发育没有肥沃的土壤、重农抑商以及闭关锁国等等,所有这些,要使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突破自然经济体系缓慢长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困难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竟是西洋的大炮。

自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取得长足发展,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原料、倾销商品,把目光盯住东方大国的中国,屡叩国门。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老大自居,闭关锁国,固守藩篱,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势,对曾经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已被历史抛在了后面的残酷现实,闭目塞听,茫然无知。假若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主动开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迎接汹涌而至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国社会也许会异彩重放。但时机一经失去,中国只有被动挨打。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朝的八旗绿营兵腐朽无能,不堪一击,中国战败。1842年8月订立《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救亡图存”由此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军事侵略说到底是为经济侵略开道的。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确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关系,在华设立租界,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自然经济的解体。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要达到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侵略目的,势必要剪断耕织结合的纽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过程,实际上就是洋布洋纱代替土布的过程。洋布价廉,又有条约关系的保护,因而逐步占领中国市场。土布没有销路,“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2卷)。这些众多的失业者和没有用武之地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自发地大量地涌入城市。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剩余劳动力的城市集中,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因此,外力的冲击,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是,传统中国要走向近代,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调节机制,实现自身的转型。而要实现自身的转型,就必须充分发展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一个时代课题。

清政府为支付鸦片战争赔款,弥补财政亏空,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农民不堪重负,无以为生,又引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之舟将把中国载往何处?

总而言之,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外交困的时代,是需要变革的时代:“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个时代,更是呼唤风云人物出现的时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时势造英雄。在时代的呼唤下,一代风云人物曾国藩走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

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湘乡白杨坪一户普通农家,6岁入学,在祖父父亲的督责下,奋发向上,勤于章句,刻苦自励,胜不骄,败不馁,经过20多年的寒窗苦读,中进士,点翰林,终于叩开了科举之门,转入仕途。

一、“癫龙”转世

在湖南湘乡县城南约130里,到处是起伏的山岗、深邃的沟壑。在乱山环峙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村庄,名叫白杨坪,清代属荷叶塘都。白杨坪很平凡,平凡得出奇,但谁能料到,就在这个舆图不载、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却走出一位曾经决定清朝运势的大人物曾国藩呢!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曾家一团喜气,乐不可支,因为这天子城(国藩原名)降临人世。蓄子添孙,本是人生常事,可是,由于曾国藩后来的丰功伟绩,关于他的出世,稗官野史也就有了种种异闻,既然说到了,不妨多说几句。

曾国藩出生时,他的曾祖父曾竟希还健在,年届古稀。在国藩降世的前天夜间,忽梦有巨虬(传说中的一种龙)自空中蜿蜒而下,直入曾宅,头悬于梁,尾盘于柱,鳞甲灿烂,把老人惊醒了。第二天早起,老人坐在屋檐下,想着昨夜的奇梦,百思不解。正静思中,忽听隔室“哇”的一声,老人知道这是孙媳江太夫人临盆了,接着家人

来报添个曾孙。老人顿有所悟，召来国藩生父曾麟书，告知昨晚异梦，说此儿有些来历，要好生养育，将来必光大我曾家门楣。麟书唯唯诺诺。说来也巧，就在国藩出世的当日，曾家屋后长出苍藤，缠绕于树，树死而藤日益苍翠繁茂，垂荫一亩，世所罕见。这一巨藤，乡人称之为“蟒蛇藤”，其形状恰似竟希翁梦中所见巨虬。据野史说，家人观藤之枯荣，可知国藩境遇如何，如国藩加官晋职，事业顺遂，则巨藤枝叶茂盛，反之则形容枯槁，巨藤似乎成了曾国藩的化身。国藩死，巨藤随之叶落枝枯，不久亦死，更令迷信的中国人感到怪异。

更奇的是，曾国藩生就一身怪癖，终生不愈，经常把曾国藩折腾得坐卧不安，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每每叫苦不迭。怪癖发作时，痛痒难耐，双手抓搔，皮屑飞扬。而其抓搔的姿态，又似虬龙张牙舞爪。饶州知府张澧翰，善于相面，观察曾公相貌，“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虬龙也”（薛福成：《庸庵笔记》第4卷，《述异》）。

虬人梦，蟒蛇藤，癖如鳞，种种怪异杂凑一起，因循附会，于是有了曾国藩虬龙转世的传说。

过去的中国人很喜欢造神。大凡历史巨人，经历非凡，从生到死可以编造出许多神话来。曾国藩虬龙投胎的传说，现在觉得可笑至极，但在当时是顺理成章、令人深信不疑的。

传说归传说，不是信史，因此，我们的笔锋还是转到现实的曾国藩身上来。

二、曾氏家族的宠儿

曾国藩的出世，的确给曾家带来兴旺的气象。

曾家原来居住在湖南衡阳庙山，清初才迁居湘乡，世代务农，薄有产业，家道不昌，过了五六百年的穷日子，直到他的曾祖父曾竟希时，才算有了点家业。在封建时代，“读书做官”最令人心向往

之,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稍有家资的人家,莫不送子弟读书求学,转求仕进。曾家家境好转,竟希自然把国藩祖父玉屏送去念书,希望十年寒窗后求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可是曾玉屏不求上进,嬉戏游玩,好逸恶劳,经常去湘潭市上与那些纨绔子弟厮混。乡里长辈讥笑他轻浮浅薄,窃窃私议;竟希翁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家业,将来一定会败在他儿子手上,“将覆其家”。玉屏听到传言,羞愧万分,决心痛改前非。竟希老矣,玉屏断了求功名的念头,持家治业,躬耕陇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这样总算家道没有中衰。

国藩祖父曾玉屏,字星冈,“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为人刚正不阿。虽为山野之民,一生“无奇遇重事”,但其“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以下省称《全集》)。在曾国藩一生中,其祖父对他的影响最大。国藩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全集·家书》)国藩性格倔强刚毅,胸怀大志,深得祖父训诲之益。玉屏翁治家极严,“男必耕读,女必纺织”,要求家人努力实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曾国藩后来治家,“一切以星冈公为法”,这八件事,则概括为“八字诀”,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克勤克俭,守之甚严,“永为家训”(《全集·家书》)。曾玉屏倡明的家风,的确确实造就了后来曾国藩一生的品行秉性。

玉屏以早年失学,引为深耻,便将希望寄托在国藩生父曾麟书(字竹亭)身上,不惜重金访求名师,望子成龙,企盼有朝一日榜上有名,博得官职,弥补自己平生最大的缺憾。不料曾麟书天资平平,屡考屡败,因此,玉屏便寄希望于孙子了。

麟书生有五子,长子即国藩,次子国潢(字澄侯,1820年生),三子国华(字温甫,1822年生),四子国荃(字沅浦,1824年生),五子国葆(字事恒,1828年生)。国藩居长,又聪慧,玉屏、麟书父子

均视为掌上明珠。

的确，国藩自幼虽非神童，但却非常儿匹比。据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所载，国藩状貌端重，自初生长到三四岁，不闻啼泣声。母亲江太夫人里里外外，忙忙碌碌，无暇顾及，他总依在祖母王太夫人的纺车旁，花开鸟语，注目流眄，像是一个有坚韧性而极不平凡的孩子。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国藩6岁时，玉屏为其设家塾一所，聘请陈雁门先生，教他读书识字。就在这一年，曾祖父竟希去世，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次年，父亲麟书因屡考不中，便在家中设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见斋”，招了10余名学生，课徒为生，一面让国藩跟他在塾中读五经，一面继续求取功名。为父作师的麟书先生对儿子自然悉心教导，督责甚严，国藩常在睡梦中被叫醒，嘱读《诗》、《书》，不到两年，竟读完了五经，开始钻研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学习八股文了。

国藩天资聪颖，一心向学，又有韧性，加上祖父、父亲不厌其烦地教诲、督责，学业大进。1824年（道光四年），14岁的曾国藩随父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成绩甚佳。次年，麟书先生在同族中开设家塾，取名“锡麟斋”，国藩仍从父苦习八股，此外，诵读《周礼》、《仪礼》及《史记》、《文选》。1826年（道光六年），国藩16岁，这年再度去长沙参加童子府试，居然名列第七。国藩信心倍增，决心叩开科举之门。

三、叩开科举之门

从长沙回来后，国藩仍从父问学，夜以继日，发愤苦读。麟书自知所学有限，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让国藩继续跟在自己身边，恐误了他的前程，应该让他往外县访求名师。听说衡阳汪觉庵先生，是声播远近的八股名师，于是，1830年（道光十年）便将国藩送到汪先生在衡阳所开的唐氏家塾去读书学文。次年，回本县涟滨书

院肄业，书院山长刘元堂见国藩诗文，极为欣赏，以为将来必成大器。经过名师指点，国藩茅塞顿开，学业益进。国藩原字伯涵，此时改号“涤生”，取涤其旧染之污，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以惕励自己，奋发向上，以新的姿态面对人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国藩23岁了。这一年可以说是他人生旅途上的转折点。就在本年，国藩参加科考，高中榜上，补上县学生员（俗称秀才）。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挣扎了20多年，考了17次，才于上年博得这最起码的功名，而国藩如此早达，怎不令曾家欢欣鼓舞！再令曾家欣喜的是，这年底，国藩与欧阳小姐完婚了，诚可谓“双喜临门”。

关于曾国藩的婚事，也有一段佳话。

1824年（道光四年）曾国藩14岁时，曾父麟书先生的好友衡阳康生欧阳凝祉（又沧溟，字福田）常到家塾“利见斋”相晤。欧阳先生也是一位名师，曾国藩后来所作《欧阳府君墓志铭》称他“课徒凡四十年，主讲莲湖书院者又十年，门下生著籍数百人”（《全集·诗文》）。14岁的曾国藩已学了几年的八股文，诗文写得不错，欧阳先生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有气势，极为赞赏。麟书先生请欧阳先生出个题试试儿子的真才实学，欧阳先生便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国藩写一首律诗。国藩稍假思索，挥毫泼墨，一气呵成，欧阳先生看了连连称好，说“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金华殿朝廷大臣的口气呀！欧阳先生爱才，当即把长女许配给国藩，她就是伴随国藩走完人生苦旅的欧阳夫人。

1834年（道光十四年），国藩离别妻子，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岳麓书院是北宋初年创建的，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在此讲过学。国藩能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对他个人发展极为有利。国藩能诗文，是书院中屈指可数的高材生，倍受书院山长欧阳坦斋先生的赏识，当然也会引起同窗妒忌。据说有位同学性情褊躁，因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

“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国藩说：“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人说：“放在床边好了！”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置了。国藩晚上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国藩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国藩中举，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国藩抱不平。但国藩毫不在意，可见他气度的一斑了（萧一山：《曾国藩传》）。这年他年仅24岁。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按惯例，乡试中式举人要在次年春进京参加由中央礼部主持的全国性会考即会试，称为“礼闈”或“春闈”。曾国藩乡试中式三十六名举人，目光当然注视到北京的“进士”头衔了。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国藩躊躇满志，第一次走出大山，“公车”北上，参加礼部会试。阴历三月中旬入闈会试，《四书》首题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次题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三题为《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诗题为《赋得“王道平平”》。看来国藩考运不佳，“会试不售”，没有中式。恰巧这年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一次，这叫“恩科”，所以次年还有一次机会。想到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如去而复来，旅资不说，时间也浪费不少，不如干脆留在京城。征得祖父、父亲同意后，国藩住进设在京城的“长沙会馆”，长沙府应试举子在此驻留，开销不多。

韶华弹指总悠悠，
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
更无清福住糟邱。

.....

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予何日斫蛟鼉。

国藩《岁暮杂感》诗(《全集·诗文》)为落第后留住京师时所作，但并无一丝半毫沮丧窘蹙之态，相反，那种“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恢廓大志，那种倜傥风采、书生意气，跃然纸上。

国藩在京依然勤于章句。1836年(道光十六年)再入礼闈，参加恩科会试，不想再遭挫折。国藩虽然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自己年纪尚轻，将来机会正多，也就淡然处之了。放榜后，即收拾行装，搭粮船顺运河南下，“出为江南之游”。国藩因久寓京师，随身盘费所剩无几，途经睢宁，正巧同乡故人易作梅在此当知县，因过访，向易借了100两银子。路费凑足了，国藩即由清江、扬州到了金陵(南京)，在金陵市上，看到一部《廿三史》，售价银百余两，国藩爱不忍释，于是典当自己的裘衣，连同从易作梅处所借银两，购得心爱之书。回到家中，麟书先生问明来由，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喜形于色地说，所借银两由家父想办法偿还，只要悉心研读这些书，就算没有白费。国藩果然“诵习益勤”(《清代七百名人传·曾国藩》)，“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如此苦读，八股、制艺自然大有长进。

光阴似箭，转眼又到了大比之年。曾家因还债，旅资稍有不济，向戚族借了32串钱，再度公车进京。

1838年(道光十八年)初，曾国藩抵达京城，所贷32串钱，只剩下3串，其苦状可想而知了。阴历三月中旬，三上春闱。主持本年会试的是钦派大总裁大学士穆彰阿及朱士彦、吴文镔、廖鸿荃。会试题目为《四书》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功夫不负苦心人，国藩如愿以偿，中式第38名进士。接着正大光明殿覆试

一等，殿试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清宣宗拔置第二名，6月23日（五月初二）引见皇帝，改翰林院庶吉士。

科举时代的翰林，为“清要词臣”，前途最为远大，外则总督、巡抚，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多由翰林出身。国藩置身翰林院，毫无疑问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国藩一向志向高远，“器宇卓犖，不随俗流，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曾文正公年谱》）。从此以后，更名“国藩”，意即为国屏藩，以期实现其远大的政治抱负。

按清朝规定，庶吉士要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三年，通过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清史稿·选举志》）。不管怎样，官是做定了。经过20多年的寒窗苦读，国藩终于叩开科举之门，转入仕途了。这年秋天，年仅28岁的曾国藩志得意满，荣归故里。曾氏家族几百年来“无以科名显者”，只有国藩第一个点了翰林，荣耀之至，自不待言。新翰林还乡，亲戚朋友前来道贺者络绎不绝。国藩祖父曾玉屏时已65岁了，想到殷殷厚望成为现实，更是欢喜异常，在曾家庭院排开酒筵，大宴宾客，煞是热闹。玉屏先生是达理之人，虽然孙子入仕为官，但家人绝不应该心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见。宴罢宾客，他告诫麟书先生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麟书先生是出了名的孝子，自然谨遵父命，兢兢业业，勤俭持家，从不让国藩操心，因此，国藩做了十余年的京官，不知有家累，专心治学，因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不说受祖父之赐。玉屏先生也告诫国藩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国藩铭刻在心，奉为立身处世的法宝，受益无穷。

在封建时代，官宦之家，名门贵族，为了显示自己家族的源远